

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



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

黄 雲 眉 著

齐 鲁 书 社

一九七九年·济南

重 印 说 明

著者黄雲眉教授已于一九七七年逝世，这次印行是按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重排的，付印前由著者的学生潘群同志参据一九五七年版复校了一次，内容未作改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

黄雲眉著

*

齐 鲁 书 社 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3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 10206·4 定价 0.95 元

目 录

引 言	1—4
韩愈文学的评价	5—66
(附) 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	67—100
柳宗元文学的评价	101—127
附 录	128—206
(一) 韩愈柳宗元传状	128—139
一 新唐书韩愈传	128
二 韩吏部行状	131
三 韩文公墓铭	135
四 新唐书柳宗元传	137
五 柳子厚墓志铭	138
(二) 韩愈柳宗元文选	140—176
韩愈文选	140
一 原道	140
二 读荀子	142
三 进学解	143
四 师说	145
五 争臣论	146
六 上宰相书	148

七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150
八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151
九	答崔立之书	153
一〇	答李翊书	155
一一	与祠部陆员外书	156
一二	与孟尚书书	158
一三	论佛骨表	160
一四	送孟东野序	161
一五	送李愿归盘谷序	163
一六	送廖道士序	164
一七	送高闲上人序	164
一八	石鼎联句诗序	165
一九	祭十二郎文	166
二〇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168
二一	张中丞传后叙	169
二二	圻者王承福传	171
二三	毛颖传	173
二四	送穷文	174
二五	杂说	175
二六	获麟解	176
	柳宗元文选	177—206
一	封建论	177
二	段太尉逸事状	180
三	捕蛇者说	182
四	种树郭橐驼传	183
五	宋清传	184
六	蝮蛇传	185
七	乞巧文	185

八	僧王孙文	187
九	三戒	188
一〇	愚溪对	190
一一	愚溪诗序	191
一二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192
一三	游黄溪记	193
一四	始得西山宴游记	194
一五	钴姆潭西小邱记	195
一六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95
一七	袁家渴记	196
一八	小石城山记	196
一九	寄许京兆孟容书	197
二〇	与杨京兆凭书	200
二一	与萧翰林俛书	203
二二	答韦中立书	205

引 言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委员会要我给唐宋散文作家写一些评价的文章,因为今日介绍唐宋以来诗歌小说之类的文章很多,尤其是对那些杰出的作家或作品,如杜甫白居易红楼梦等的讨论,真是一时钟铎齐鸣;而于散文作家或作品的介绍,则异常寂寞,这就中国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来说,确是一种偏枯的现象。虽然我是一个治历史学的人,对文学是外行,但文史哲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我便尝试性地写了一篇“柳宗元文学的评价”给文史哲发表。侥幸得很:这篇文章的发表,居然引起了国内外不少读者对柳宗元的深厚的同情。他们认为:象柳宗元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的政治斗争性的杰出的文学家,就因为他的政治斗争的失败,使他的始终玉洁的人格,蒙受了千载的诬蔑,从而使他的寒芒熠熠的文学内容,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这在今日是完全有替他洗刷的必要的。我的文章虽然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也总算替他尽了一点洗刷的责任。自然,我希望我的文章,仅仅是介绍柳宗元文学的开端。可是,当文史哲要我写韩愈文学的评价时,我却认为:韩愈柳宗元名字的不可分离,只是因为他们是唐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同是唐代散文和骈文斗争运动的领导者;而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恰恰相反,韩愈依然站在旧的落后的势力一边,而柳宗元是站在新的进步的势力一边的。韩愈柳宗元在政治上表现的进步与落后,无疑会影响到韩愈柳宗元

文学内容的进步与落后，那末我们介绍了内容进步的柳宗元文学，也就没有必要再介绍内容落后的韩愈文学了。并且介绍柳宗元的文学时，也不可能不联系到韩愈的文学。秉此理由，我便准备替文史哲写出第二篇文章——“韩愈文学的评价”。又我的不准备写这篇文章的另一理由，是历史研究早就发表过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我想陈先生的论韩愈，不可能不论到韩愈的文学，我们只就陈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补充或讨论也就够了。可是，当我仔细读了陈先生的文章时，觉得陈先生所提出的关于韩愈文学的问题：如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思想的问题，韩愈的古文是通过韩愈先以这种文体写作小说的尝试而后才获得成功的问题，乃至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佛家偈颂的进步形式的问题，虽然都是陈先生的一种新颖的见解；而我对这些问题，却都有不敢苟同的意见。并且陈先生的文章，归根结蒂，还是传统地证明韩愈的儒学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而我则坚决认为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文学不是儒学。不管我的意见，和陈先生的意见，孰为正确，要之从这里可以证明，我们对韩愈文学的认识，还是不一致的。不一致而求其一致，则介绍韩愈的文学，而加以往复的讨论，就有其必要了。同时我又考虑到，韩愈的政治表现不及柳宗元，从而使韩愈的文学内容也不及柳宗元，这是事实；但韩愈散文的高度熟练的技巧，跟他的领导散文和骈文斗争运动走向胜利的坚决的精神，柳宗元却不及韩愈，这也是事实。只介绍柳宗元的文学，而不介绍韩愈的文学，片面地低昂历史人物，是不符合今日对待历史人物的忠实的态度的。并且单从洗刷柳宗元的诬蔑的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介绍柳宗元，同时又介绍韩愈，以韩愈在政治上的落后的表现，来对比柳宗元在政治上的进步的表现，不是可以替柳宗元洗刷

得更全面更有力吗？秉此理由，我除写了一篇“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和陈先生在文学问题上乃至在儒学问题上作必要的讨论外，我终于改变我原来挟着成见的片面的看法，替文史哲写出了早就要我写出的“韩愈文学的评价”。

以上是我考虑写出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的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我原来没有给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写成册子作系统的介绍的计划，这三篇文章，恰恰都是倒过头来写的。但因为每篇属稿之际，还能相当地扣紧本题，不让它拉扯到枝叶上去，所以这里把它们顺序排列，也还看不出上者为裳而下者为衣的毛病。同时，每篇之中，虽然同样提到某些问题，而叙述的详略，也尽可能压缩在一定的用以互证的范围内，不致成为可厌的重复。至于评价文学的作品，原不是公式化地都得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阶级成分；但我们肯定韩愈柳宗元的文学，主要是肯定他们领导唐代文体改革运动走向胜利的业绩，而这个著名的唐代文化运动文体改革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不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再度繁荣，和当时新兴中小地主的一般要求，为其主要的因素，不分析这些主要因素，而把这个辉煌的文化运动的成功，完全归结为一二领导者个人努力的成功，谁也不能承认这种话是正确的。所以我在韩愈篇，依然把这些主要因素，作了较详的分析；尽管我的分析的水平，还不可能没有较大的甚至是原则上的错误。

本册子的内容，除了正文二篇，附文一篇外，另录新唐书韩柳传及韩柳碑志共五篇，又选了韩柳作品四十八篇。我所以这样做，是接受了一位同事给我提出的意见：因为我的文章，很少引到韩柳作品的大段原文，我没有也不准备象过去评点家

那样，把韩柳作品的某篇某段的组织和所谓“笔法”介绍给读者；我的文章，大部分只是围绕着韩柳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进步意义的这一中心问题加以发挥而已。同时，因为韩柳都是读者最所熟悉的文学家，我没有也不准备在我的文章里，把他们的历史，再作系统的介绍。这些对广泛的读者来说，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要求的。选录一些史传碑志，跟一些未必具有代表性的韩柳作品，附在后面，既可以弥补我的文章的缺陷，也可以节省读者一部分翻检之劳，我想，这种实事求是的宝贵的意见，我和读者应该同样欢迎吧。

恳切地希望读者多多指教！

黄 霁 眉

一九五七年一月

韩愈文学的评价

韩愈是中国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杰出的古典散文家，这是过去早就毫无异议地肯定的了。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肯定呢？我们以为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只是这里先得说明：现在肯定的意义，和过去肯定的意义，已有本质上的区别。过去肯定韩愈的文学，往往和肯定韩愈的儒学联系在一起，似乎韩愈文学的成就，应该归结为韩愈儒学的成就，换句话说，没有韩愈儒学的成就，也就没有韩愈文学的成就。所以他们认为韩愈文学的作品里，虽然还有若干篇未免“整孔孟之旨”，^①但大部分可以说是能做到皇甫湜所谓“扶经之心，执圣之权”^②的了。这种空洞地含混地把韩愈的儒学和韩愈的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肯定，实际上是受了韩愈师弟的文学与儒学合一的启示，而以韩愈所自许者许韩愈而已。到底韩愈可以被肯定的，是儒学或是文学，他们还没有搞个清楚。可是这种肯定，却是过去最有力量的一种肯定，原因是由于这种肯定，最为宋以来效法韩愈的古文家——散文家所乐于支持；而这种古文家，一般是不爱钻研理学，而只爱和理学家争取羽翼斯道的牌额者。现在我们对韩愈的肯定，主要是韩愈的文学，不是韩愈的儒学。韩愈的文学，是有

① 见旧唐书韩愈传。

② 见皇甫持正集六韩文公墓铭。

卓越的成就的，而他的儒学，则仅仅跨在文学的背上腾踔虚誉而已，它的本身谈不到有什么独立的成就。不但没有独立的成就，严格地说，韩愈还不是过去所谓真正的“守道君子”，^①韩愈的崇尚儒学，是言有余而行不足的。因此，我们惟有以韩愈的儒学还儒学，以韩愈的文学还文学，然后才能看到韩愈文学真正的精神面貌。其次，我们肯定韩愈的文学，主要是肯定他的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上，即在文体改革及其领导文体改革的运动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不是肯定他的文学的形式内容，都已进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认为毫无遗恨的境界。因此，我们必须揭出韩愈文学光辉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揭出韩愈文学阴暗的一面。

以上是现在和过去肯定韩愈文学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大概。

以下分三节述之：一、韩愈文学产生的主要因素；二、韩愈文学的成就及其领导古文运动的胜利；三、韩愈在文学中所反映的思想及其政治、生活。

一 韩愈文学产生的主要因素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卒于穆宗长庆四年（八二四），这一个杰出的古典散文家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唐帝国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逐渐由中衰转向中兴的时代，因而它又是唐代文化再度发展特别是小说散文发展最盛的时代。为了说明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有把过去对代德宪三朝中央和藩镇问题的错误看法澄清一下的必要。

^① 见昌黎先生集一八与孟尚书书。

过去以为代宗德宗对那些安史余孽——藩镇的跋扈，采用了“覲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嫔之”^①的姑息政策，只会使藩镇的“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因而招致了“赵魏燕齐，同日而起，梁蔡吴蜀，蹶而和之”^②的藩镇对中央进一步的威胁。至宪宗即位以后，凭着他的“睿谋英断”，^③自元和元年（八〇六）起，至十四年（八一九）止，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镇压，（元和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锜；五年擒卢从史，得泽潞邢；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④）这才使“五十载已终之土，复入提封，百万户受弊之屯，重苏景化”，^⑤所以说“唐室中兴，章武而已”，^⑥应该是一个毫无异议的肯定。我们以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固然唐代藩镇割据势力的形成，和中央的让步政策不能无关系；但让步政策的决定，主要是决定于安史之乱，中央区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藩镇区域比它差得多，不让步，可能会使中央区域的经济破坏得更严重。这样，我们难道不可说，正由于这种让步政策使代宗德宗朝中央区域的经济没有大量的战

① 见新唐书藩镇传。

② 同上。

③ 旧唐书宪宗纪引史臣蒋係语。

④ 见李翱李文公集一〇百官行状奏，参旧唐书宪宗纪。惟李奏元和二年（八〇七），平蜀斩刘闢，韩愈平淮西碑亦同，而韩愈元和圣德诗序，又有元年十月闢伏诛的话，则与纪同，今姑从二年。又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一〇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元年修惠琳暨辟铸，季年枭元济及师道，锜被俘于三年无问题，此元年当作初年。又奏五年擒史宪承，则非奏原文，据纪及韩愈论捕贼行赏表改卢从史。

⑤ 见旧唐书穆宗纪。

⑥ 旧唐书宪宗纪引史臣蒋系语。

争消耗，它才能在某些条件的配合下，逐渐由稳定走向发展，而为宪宗朝的大张挞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吗？

所谓某些条件，我们指的主要是，刘晏的对漕运法，和刘晏杨炎的对财赋制度的若干重要的改革。有了刘晏漕运法的改革，才使那条在安史之乱以后一部分航线遭到梗阻^①的运河，又能经常地灵活地发挥了它的输送当时中央所最仰仗的江淮财赋的作用；（惟德宗初年，曾有若干次被割据势力侵害。）有了刘晏榷盐法杨炎两税法等财赋制度的改革，才使当时中央能实际地有效地掌握了江淮财赋，保证了代宗德宗朝岁入的不断增加，（代宗朝从四百万缗的岁入，至大历末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推行刘晏榷盐法所得的江淮盐利，从四十万缗增加到六百万缗，超过了总岁入的半数。^②）特别是能和当时已发展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态庄园制相适应的两税法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刘晏漕运法和刘晏杨炎财赋制度的改革，对代宗德宗朝中央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反过来说，这些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一定的生产水平为其基础，而没有大量的战争消耗，应该是代宗德宗朝所以能有一定的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

唐代后期的农业生产，自代宗朝开始，便不断在恢复着，发展着；而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可能发展得更迅速。虽然安史之乱的破坏是严重的，但可以设想，没有遭到破坏或者破坏较差的

① 通鉴二二三：“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遇险劳费”。

② 旧唐书刘晏传：“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且过半。”唐会要七八同。

通鉴二二六：“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

区域的经济，依然有它的雄厚基础可以继承；而当时地方财赋的不向中央上贡，也不等于说地方和中央的经济，完全断绝了联系。因此，唐代后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有它们的优越条件的，特别是那些没有遭到梗阻的国内外交通线，以及没有遭到破坏的交通建置，能给予商业发展以更大的帮助。就手工业的发展说，固然那个定州的私营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即置有五百张绞机的何明远的手工业作坊，^① 出现不会太早；但它必然在代宗以来官私营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是可以断言的。就商业的发展说，除了宪宗朝飞钱的盛行，可以证明德宗朝乃至代宗朝的商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外，曾经在肃宗朝被田神功一度破坏并杀死了大食波斯等国外商千余人的扬州，^② 显然在代宗朝已是一个繁荣的都市了，这只须看大历十四年（七七九）禁止王公百官及地方长吏列置邸肆与人（民）争利的命令^③ 可以知道。而扬州至唐代末年，还是“刀布金玉积如阜”，^④ 还是可以称“富甲天下”，^⑤ 显然又是代宗以来扬州商业能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这样说，不是仅仅在说明扬州商业的发展，同时在说明扬州是管钤南北的商业都市，扬州的商业发展，也就是南北都市的商业发展的反映。若唐代后期的海上贸易，则德宗朝的广州，已有官僚资本制造海船，在那里循环不绝地进行着，^⑥ 可见比唐代前期更发展了。因此，我们断言唐代后期经济的发展，是开始于没有

① 见太平广记二四三引朝野金载。

② 见新旧唐书邓景山传。

③ 见唐会要八六。

④ 见新唐书田颢传。

⑤ 见旧唐书高骈传。

⑥ 见旧唐书王鐸传。

大量的战争消耗的代宗德宗朝，而不是开始于号为中兴的宪宗朝。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对韩愈所处的时代的经济作这样的分析呢？理由是：第一，在说明唐代后期城市人民和在政治上已获得地位的新兴地主阶层所喜爱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正和它的经济基础一样，应该从纵的继承和横的联系方面去看它的发展。第二，在说明唐代后期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正和它的经济基础发展的过程一样，代宗朝是中兴开始时期，德宗朝是向前发展时期，而韩愈的文学和他领导的文学运动，则恰恰和唐代后期文化向前发展时期的要求相符合的。第三，在说明唐代后期文化的发展，主要是文学和艺术，特别是文学发展得更迅速；就文学说，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特别是散文有了韩愈的领导，能成为唐代后期文化中一个最辉煌的运动，而这一个最辉煌的文化运动，不说正是它的经济基础最突出的体现。那末，我们为了评价韩愈文学，而对韩愈文学产生的社会经济作较详的分析，似乎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再说一说和韩愈的文学有密切关系的韩愈的阶级成分：韩愈自己说他“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①又说他“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②可见韩愈的地主阶级成分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属于中小地主，即新兴地主阶层，或者属于大地主，主要是世族地主阶层，还是一个应该加以分析的问题。

旧唐书本传说韩愈“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

① 见昌黎集一感二鸟赋。

② 见同集一六上宰相书。

孤，养于从父兄。”新唐书本传则说韩愈“邓州南阳人。……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在短短数行内，新书的叙述，和旧书不同者凡三点：其一，改旧书昌黎为邓州南阳，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①本作南阳，新书改南阳是对的，而于南阳上加邓州字，仍不能没有问题。其二，新书根据李碑，说韩愈的父亲仲卿做过武昌令，而且有可以“刻石颂德”的美政；根据李翱韩吏部行状，^②皇甫湜韩文公墓铭，又说他官终秘书郎。虽然名位不大，到底不应该象旧书武断地说他“无名位”。其三，改旧书从父兄为伯兄，这是旧书显然的错误。韩愈文中说到兄嫂的地方，不一而足，而文中称韩会为宗兄，^③为元兄，^④为伯氏，^⑤其为韩愈的长兄，可以断言。旧书作者似乎都没有看到，未免近于荒唐。为了确切地说明韩愈的阶级成分，这些新书纠正旧书的话，我们觉得有加以引伸的必要：

韩愈文中自称昌黎韩愈者凡九次，^⑥李翱行状，皇甫湜墓铭，并作昌黎。韩愈子昶自撰墓志，也称昌黎韩昶，^⑦则旧史以韩愈为昌黎人，不能说是错误；可是依照朱熹的意见，韩愈的自称出昌黎，可能和“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一样。汉书地理

① 见明郭云鹏刊本李太白集三〇。

② 见李文公集一六。

③ 见昌黎集二四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④ 见同集二三祭郑夫人文。

⑤ 见同集一复志赋，一〇过始兴江口感怀诗。

⑥ 见同集汴州东西水门记，送陆歙州诗序，送窦从事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施先生墓铭，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君夫人苗氏墓志铭，瘞砚铭，题李先生壁等文。

⑦ 见孙星衍续古文苑一九。